

种桑与十六国政治文化转型

张孙小大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桑树本是汉地农业生产的常见物种,却在魏晋时期气候严寒、不宜种植的大背景下,进入了辽东鲜卑慕容部的视野。桑树在汉地的文化表征,促使前燕慕容廆不惜浮海求桑,借此推动政治文化转型。北族征服者进入汉地后,藉种桑对原有政治文明进行改造。种桑与提倡汉化的方向一致,是秩序恢复的象征;而恪守民族本位的北族征服者,往往起初将桑树焚伐毁荡。北族波浪式次第南下的历史,使桑树经历了不断种植、不断焚毁的波折,处于“屡毁屡种”之中,在北魏才正式回归到应有序列。种桑作为华夏化历史进程的缩影,折射出北族向中原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动向。

【关键词】种桑;慕容廆;北族政权;政治文化;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4-0024-12

Planting Mulber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Sixteen Countries

ZHANG Sun-xiaod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Mulberry is a common species amo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Han area, b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vere cold unsuitable for planting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it entered the vision of Murong tribe of Xianbei in Liaodong.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mulberry trees in the Han area prompted Murong Wei of the Former Yan to go to the sea to seek for mulberry trees, thereby launching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entered the Han area, they transformed the original political civilization by planting mulberry. Planting mulberr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motion of sinicization, and is a symbol of order restoration. However,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who strictly adhered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ten burned and destroyed the mulberry trees at first.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moving south in waves made the mulberry trees undergo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frequent planting and burning. It was in the process of "repeated destruction and planting", and it was only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at it formally returned to its proper sequence. As a microcosm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planting mulberr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ern nationalities to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mulberry planting; Murong Wei; Northern regime; political culture; climate change

《晋书·慕容宝载记》段末记载了其先祖慕容廆曾借桑江南一事:

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①

【收稿日期】2020-12-19

【作者简介】张孙小大(1995-)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史。

^①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34《慕容宝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097页。

桑树是中原农业生产常见物种,“劝课农桑”也是古时循吏的应有之义,乍看作为一国之君的慕容廆此举似乎并无异常。然而鲜卑慕容氏出于辽东松漠之间,“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①,丝织品在日常中并不实用,丝绸衣物所代表“章服之美”^②的华夏文明观更与其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魏晋时期气候寒冷,慕容廆时代正处于第一个冷谷^③,桑树很难正常发育、生长,桑叶产量将受影响,且冻枯率较高^④。此外辽东局部小气候并不十分有利于蚕种生长^⑤,在此时此地种桑几近无利可图,慕容廆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呢?

这则简短的引文实际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身处辽东的鲜卑慕容廆在寒冷气候下,不避险阻,推广植桑,本身即耐人寻味。本文希望通过“种桑”这一平常无奇的视角,再现北族、中原两种传统的历史遭遇,结合气候变化因素,重新体认中古时期华北大地不断出现、旋起旋灭的种桑景观。一窥在中古早期,众多北族政权初入汉地后引起的困惑、抵触和碰撞,加速自身政治文化转型的进程,察觉到更细微透彻的历史动向。

一、汉地桑树的文明象征

作为初入中原的先驱,刘渊、刘聪父子并未留心桑蚕之事。史籍初见锐意种桑者,即是前揭慕容廆。此事在早期中古意义重大,于北族政治转型影响颇深,故《晋书》不惜于《慕容宝载记》中补记。关于慕容廆曾借桑江南,在经济史上讨论甚多。李伯重认为:“我国桑树,向来以山东兖州一带的鲁桑称最上。”同时引章楷之说表示了怀疑,“辽东离鲁桑原产地山东很近,慕容廆何必要舍近求远呢?”以为慕容氏此举大概是因山东战乱,才浮海求桑^⑥。邹逸麟以为:“时慕容廆占据辽东,与黄河流域的石勒政权为敌,而与东晋政权关系良好,故而从海路由江东输入桑种。”^⑦王利华主编《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只叙其经过,未加详辨^⑧。事实上慕容廆此举自有彰显华夏化进程的深意,而不宜只以南北间作物引进观察。

① [刘宋]范曄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979页。范曄以乌桓与鲜卑风俗相近,故同传。

② 杨伯峻撰:《列子集释》卷5《汤问》篇,中华书局,1979年,第164页。

③ 关于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自然可桢以来积累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较为重要的有郑斯中、冯丽文:《我国冷的时期气候超常不稳定的历史证据》,《中国科学(B辑)》1985年第11期;葛全胜、郑景云、方修琦:《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关于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尤其是桑树种植的影响,见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分载1985年第2期、1986年第1期、1987年第2期。新近研究则有夏如兵:《气候剧变与元代黄河流域蚕桑业的兴衰》,《中国农史》2020年第2期;夏如兵、严火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中国蚕桑业中心转移》,《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2期。

④ 在现代品种和种植技术的条件下,辽宁省蚕业研究所1963年的调查研究数据表明,若北方冬季持续低温,气候波动剧烈,解冻与复冻交替出现,冻枯率可高达29.3%。见武玉璧、潘一乐、程嘉翎:《桑树冻害与安全越冬》,《蚕桑通报》2008年第1期。

⑤ 蚕种生存温度范围在7.5℃至37℃之间,蚕在7.5℃以下停止发育,37℃为蚕种临界高温。若在16℃以下则蚕体变冷,发育缓慢,蚕茧亦小。在20℃至30℃之间活力较大。见中等农业学校养蚕学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养蚕学》,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第9页。

⑥ 讨论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47页。

⑦ 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6页。

⑧ 王利华主编:《中国农业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121页。

桑树原产我国,桑叶可用于养蚕,由蚕所吐之丝经缫丝、染色等工艺可织成织品,如“罗”“纹”“锦”“缯”“帛”等。既可供日用,也作为赋税上缴国家。历代以农桑并举,视为根本,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①,两汉于宫中设“蚕室”“织室”^②,又有暴室为“织作染练之署”,如汉宣帝岳父许广汉,就曾为暴室啬夫^③。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地带,又是农桑丝织业极为发达的地区,以织品为衣被当作了中原文明演进的标志性节点。《汉旧仪》:“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群神五时之服。”《白虎通》称上古时百姓“茹毛饮血而衣皮革”故“是以圣人法之用于为绋服,为百王不易也。”^④汉地对于蚕桑丝织所代表的“衣被天下”,成为了自身认同符号,对于边裔非华夏族群,则称“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⑤丝绸作为奢侈品,很早就充当了对外交往的媒介。西汉初孝文帝即赠冒顿单于“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绋,绿缯各四十匹”,使匈奴“好缯絮食物”^⑥,以至于“夫中国一端之缯,得匈奴累金之物”^⑦,又如司马相如等人使西南夷带去大量丝帛织品,“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⑧,丝绸对其具有莫大吸引力,成为招徕外族的手段。

随着中原自我认同的演进,蚕桑正逐渐成为文明的象征。《东观汉记》云“茨子河充为桂阳太守,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缁著衣。民惰窳,少粗履,盛冬皆以火燎。”^⑨桂阳郡偏僻悬远,“俗不种桑”。《华阳国志》称涪陵“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戇勇,多獯蠶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蚕桑,少文学。”^⑩“无蚕桑”与“斗讼必死”并举。又称牂柯郡“俗好鬼巫,多禁忌,畚山为田,无蚕桑。”^⑪涪陵、牂柯都远离中原,初来此地的汉人观察既有猎奇色彩,又充满自身意志投射,“无蚕桑”几可视为未开化的同义语,“蚕桑”成为重要的文明符号被反复提及。虽然以当时民众日常穿着而言,麻布远较丝织品为普遍。直至唐代,《十道志》记岭南容州风俗亦谓:“夷多夏少,鼻饮跣足,好吹葫芦笙,击铜鼓,习射弓弩,无蚕桑,缉蕉葛以为布。不习文学。”^⑫伴随着中华版图的扩大,地理、风土所代表的博物学知识边界也不断扩展,若域外之地文明富庶,也会以汉地观念加以论述,《魏书·西域传》即称当时的“大秦”:

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⑬

“大秦”的得名被归因于“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在《魏书·西域传》中“大秦国”最少离奇古怪之事,表述最像汉地,而罗马不可能种有桑树,无法“人务蚕田”。但在汉地史官看来,任何礼乐之邦显然都应该具有桑麻、蚕田。

① 见[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8页。

② 见[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90《酷吏传》附《咸宣传》:“咸宣……阑入上林中蚕室门”,第3662页。同书卷2《惠帝纪》载:“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第90页。可知蚕室、织室都在宫中。

③ [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8《宣帝纪》,第236页。

④ 分见[汉]班固撰,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2《论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中华书局,1994年,第50-51页;卷10《绋冕》,第495页。

⑤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12《王制》,第2896-2897页。

⑥ 并见[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上,第3758、3759页。

⑦ [汉]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1《力耕》篇,中华书局,1992年,第28页。

⑧ [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95《西南夷传》,第3839页。

⑨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8《茨充传》,中华书局,2008年,第799页。

⑩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⑪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4《南中志》,第260页。

⑫ 见[北宋]乐史等编,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67《岭南道》容州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3190页。

⑬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2017年修订版,第2469页。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前贤以为河西一带自然条件不适宜桑树生长^①,即多引刘宋时人郭仲产《秦州记》一段文字为证:

《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度汧、陇,无蚕桑。八月乃麦,五月乃冻解。”^②

郭仲产《宋书》无传,《史通》言“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石事,集《邺都记》《赵记》等书”^③,《太平广记》:“宋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俄而同义宣之谋被诛焉。”^④大略可知郭仲产曾任尚书库部郎,篡后赵时事,应得见不少图书,从佚文来看著有大量地理志书,并跟随刘义宣在荆州活动。然郭仲产仕于刘宋孝武朝,南北对峙下很难到达陇西一带目睹实情,郭仲产将地理上的“汧、陇”作为从文明到荒蛮的界限,对应景观则为“无蚕桑”。有趣的是郭仲产“度汧、陇,无蚕桑”说并不属实,只是中原士人对边地的想象。

《晋书·张天锡传》:

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及归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国破身虏,多共毁之。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天锡应声曰:“桑甚甜甘,鸱鹑革响,奶酪养性,人无妬心。”^⑤

张天锡亡国后随苻坚南伐,淝水战败归降东晋,将“桑甚甜甘”作为“西土所出”的象征夸耀于司马道子,足证河西多有桑蚕,或许还优于江南。早在晋惠之时,张轨“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课农桑,拔贤才。”^⑥前凉覆灭后,后秦姚兴凉州刺史王尚“轻身率下,躬俭节用。劳逸丰约,与众同之。劝课农桑,时无废业。”^⑦《通鉴》总结凉州前后时事称“张轨及二子寔、茂,虽保据河右,而军旅之事无岁无之。及张骏嗣位,境内渐平。骏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强,远近称之,以为贤君。”^⑧其后张重华嗣位,史称“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⑨故陈寅恪论隋唐制度渊源时特意标出河西一地,“盖张氏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迁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喘息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世也。”^⑩魏晋南北朝经济多由桑麻织品为流通媒介,河西如“无蚕桑”很难想象会成中州士人趋附之地。概而言之,或正是蚕桑丝织业给了河西张氏以经济支撑,使其“民富兵强,远近称之”。

无论是根本无桑,却被认定“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的罗马;还是一直种桑,因地僻悬远和文化偏见被想象书写,断定“度汧、陇,无蚕桑”的河西,其本身有无桑树并不重要。在中原文化传统中,桑树成为了判定政治文明水准高低的标志物,是促使慕容廆浮海求桑的重要因素。

①《秦州记》此段记叙对后世影响甚大,如史念海即据此以为陇右早寒,不宜种桑养蚕,但亦提出“(陇右道)也不是绝对无桑树”,见氏著:《河山集 五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8页。

②其书已佚,引文赖李贤注保存,见[晋]司马彪《续汉志·郡国志》“汉阳郡”条下注,《后汉书》第3518页。

③[唐]刘知幾撰,程千帆注:《史通笺记》外篇《古今正史》,中华书局,1980年,第240页。

④[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41《灵征》七,中华书局,1961年,第1017页。

⑤[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86《张天锡传》,第2252页。

⑥[北魏]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澹萌、罗新、华喆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67《前凉录》一,中华书局,2020年,第782页。

⑦[北魏]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澹萌、罗新、华喆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52《后秦录》四,第656页。

⑧[北宋]司马光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95,咸康元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3004页。

⑨[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86《张重华传》,第2240页。

⑩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页。

二、政治转型的先声：从浮海求桑到“桑梓苑”

慕容廆属意种植桑树，名为种桑，实为汉化。种桑被视为“王业之隆”的开端。早在乌桓时，其经济即兼具了农、牧、渔多种成分，王沈《魏书》称乌桓“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色稌、东墙……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国。”鲜卑在轲比能时期，亦“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①，部族早期具有较多农业文化属性。但世居辽东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慕容鲜卑，并未种植桑。在前揭认知里依然为荒蛮之地。《后汉书》描述其生活“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②《三朝北盟会编》称女真“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市易惟以物博易，无钱无蚕桑无工匠，屋舍车帐往往自能为之。”^③早期女真如此，鲜卑应相差不远。《辽史》以“长城”^④为界概述南北不同习俗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⑤并称阿保机父叙述遼时方“始置城邑，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盛赞“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于此乎！”^⑥契丹人以为正是“树艺桑麻”才使“王业之隆肇迹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中古北方族裔中，鲜卑慕容部自初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汉化倾向，与后起的刘聪、赫连勃勃等政权反差强烈。早期部族具有的农业文化属性，或是其易于接受华夏化的一大因素。《晋书》即称鲜卑慕容氏得名是因心羨“步摇冠”而戴之，讹为“慕容”^⑦，其说固不可信，却可窥时人看法。慕容廆父涉归即慕华风^⑧，至其子慕容廆又言“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原”^⑨感慨自己“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⑩，先后八次遣使两晋^⑪，与中原王朝联系紧密，本身即具有强烈的汉化倾向^⑫。慕容廆汉文化水平颇高，《晋书·慕容廆载记》载慕容廆在太康年间^⑬晤张华时事：

魔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杰有大度。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魔童冠时往谒之，华甚叹异，谓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因以所服簪帻遗魔，结殷

① 分见[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832、838页。

② [刘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79页。

③ [北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18页。

④ 实际上此时地理上的“长城”已多入辽土，此处“长城”是一种政治文化概称。

⑤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2《营卫志》中，中华书局，2016年修订版，第423页。

⑥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56《仪卫志》二“国服”条，第1007页。

⑦ “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见《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⑧ “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见《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⑨ [北魏]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激萌、罗新、华喆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3《前燕录》一，第280页。

⑩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10《慕容廆载记》，第2831页。

⑪ 见崔明德、庄金秋：《略论慕容鲜卑与两晋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9期。

⑫ 关于鲜卑慕容部汉化进程研究甚多，可参看郑小容：《慕容廆汉化改革略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5期。杨毅：《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4期。黎虎、金成淑：《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⑬ 按张华在太康三年（282）三月拜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慕容廆正在其节制之下。张华于太康六年（285）征为太常，疑此数年间一直在幽州。见姜亮夫：《张华年谱》，《姜亮夫全集》第22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7-450页。

勤而别。^①

张华博学多闻,尤善品评人物,能予一外地殊族人物如此礼遇,实属难能可贵,足证慕容廆之汉化水准。以慕容廆与汉地之关系而论,属意引进桑树种植顺理成章。鲜卑部原多是“马逐水草,人仰湏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②欲肇迹王业,先树艺桑麻,“有辽王业之隆,其亦肇迹于此乎!”虽出后来记叙,却也确认了“蚕桑”与“王业”间的关系,桑田错落的景观被当作汉地先进文明的“样本”。种桑作为最常见,似乎也是最易学习的一种方式,正式进入到后进族群向先进文明取法的序列中来。相较于车马衣服,宫室营建此类非典籍不可的“汉法”,种桑就显得轻巧,面临的争论也更少。身处“北地—中原”夹缝下生存的慕容廆,想完成任何一种习性、风俗、行为的转变都面临情势失衡的考验。种桑实际上差不多是北方族群最先愿意接受汉地传统的行为模式。而慕容廆帐下聚集了大量河北、山东一带的流亡士人^③。青冀徐兖自汉以来即为农桑发达之地,丝织业兴盛^④,占据辽东,有地利之便的慕容廆决意种桑顺理成章。

若考虑到魏晋时期气候大背景,慕容廆所为更能彰显向华夏化转型的决心。魏晋整体气候寒冷,较温暖的两汉变化急剧^⑤,长时段的气候变化又容易短期内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对农业生产影响颇大,也不利于桑树繁育^⑥。据研究,魏晋南北朝反常陨霜、降雪记录竟有62次之多^⑦,“陨霜杀桑”更是频见史籍。如太康二年三月甲午,“河东陨霜,害桑”;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陨雪杀桑麦”^⑧;景明二年三月辛亥“齐州陨霜,杀桑麦”;四年三月壬戌,“雍州陨霜,杀桑麦”;辛巳,“青州陨霜,杀桑麦。”^⑨桑树生长喜温热潮湿,桑叶至少在12℃以上才开始萌芽,生长适宜温度在25~30℃之间,若气温降到12℃以下则会停止发育,桑树进入休眠期^⑩。在休眠期若出现持续低温,加上早春气温骤降,很容易造成冻害,导致桑树地上枝干干枯,地下根系腐烂^⑪。而上述所引史料都在农历二、三月间发生了霜降的异常气候,正是桑叶抽芽之时,对桑树繁育打击沉重。

自元后明、清进入约500年冷期以来,长期困扰北方桑树生长的即是低温冻害问题,在寒冷的魏晋亦然。郑景云等人的研究表明,魏晋时期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平均较现代约低0.5℃,并在公元270—350年、450—530年间出现了气候最寒冷的两个低谷,第一冷谷最低气温甚至要比今低1.2℃^⑫。辽东地区气候严寒,冬季漫长,无霜期远较华北、江南为短,春季易起风沙,大风低温天气屡作,若再遭霜降冻害,对桑树打击更为致命。桑树在持续低温后,抗温力明显减弱,新萌的枝条、桑叶和桑芽将冻伤甚至冻枯^⑬。结合辽东具体气候,春天回温过于迅速,空气中水分蒸发量大,地表却回温缓慢,桑树枝条水分容易供应不足,出现桑条抽干、干枯的情况。以当时环境与地理情势,桑树很难在如此低温、冻土环境下生

①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②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59《食货志》上,第1025页。

③ 有稽可考的就有如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北海逢羨、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平原刘赞等。以上俱见《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3《前燕录》一。

④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8—591页。

⑤ 事实上时人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沈约撰《宋书·五行志》中即有“恒寒”一条。

⑥ 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⑦ 引自郑景云、满志敏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中的相关统计,《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2期。

⑧ 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9《五行志》下,第873、874页。

⑨ 并见[北魏]魏收撰:《魏书》卷112《灵征志》上,第3165页。

⑩ 任迎虹主编:《桑树栽培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⑪ 武玉璧、潘一乐、程嘉翎:《桑树冻害与安全越冬》,《蚕桑通报》2008年第1期。

⑫ 郑景云、满志敏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东部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2期。

⑬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主编:《中国桑树栽培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34—36页。

长发育。

魏晋时期整体气候条件,辽东局部气候特点,都很难支撑桑树正常发育,甚至可能出现大面积冻伤。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桑树在气温降至15℃以下时,桑叶停止发育进入休眠,此时虽产量停滞,但因其有较强抗寒能力,却能在零下40℃的酷寒下维持生命,依旧得以存活^①。换言之慕容廆所种桑树,因气候条件限制不可能具有较高产量,获得经济收益,更有可能呈现出一片枯而不死,徒有其表的桑林景象,与其向往的汉地桑粮间种有较大差距。

慕容廆在辽东开展的种桑活动实际上已变成一种汉化景观。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下,桑树极难成活,刻意种植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效果。桑树代表着汉化肇迹与国运兴衰,是“王业之隆”的开端。彰显着鲜卑慕容竭力摆脱汉人典籍“无蚕桑”模式叙述,试图融入中原的努力。《十六国春秋》云:“廆终而桑死,(慕容)垂以吴王中兴,桑乃复生。”^②在《十六国春秋》作者的表述里,桑树的成活竟与前燕国运息息相关。事实上《十六国春秋》已将桑树作为慕容廆事业的象征,把桑树存活同其生命联系起来,自有所本之历史情境与时人心态,固不应单纯以灵异诡怪视之。其所彰意象甚明。至慕容垂建立后燕(386)“以吴王中兴”时,或许因气候已逐渐走出了公元270—350年的第一个冷谷,开始升温,“桑乃复生”。

不可忽略的是,慕容廆所为亦有其现实政治需要。晋末丧乱,大量侨民避地辽东,《慕容廆载记》叙封裕之言云:

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圣之资,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继武闡广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罢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

短时间内治下人口增加十余倍,尚有十分之四人口没有土地,提倡华夏化可一举解决现实与政治转型两大问题。除劝课农桑的实用目的外,种桑亦可将习惯迁徙的部民固定于土地之上,缓慢地向中原的租税管理方式靠拢,从而被动改造原有文化。慕容廆麾下聚集了大量汉地流亡士人民众,稍加问讯即可知此时此地种桑之不易。而慕容廆不顾气候、地理限制,对此孜孜以求,甚至不惜浮海求桑,种桑成为了前燕政权政治文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慕容廆的种桑事业为其子慕容皝继承,继续按“王业之隆”的既定轨道运行,史载建元元年(343)“皝躬巡郡县,劝课农桑,复大起龙城宫阙”,将桑树景观进一步扩大,已仿汉法营造宫殿,并“立藉田于朝阳门东,置官司以主之”。田租丁税悉“依魏晋旧法”^③,很可能囿于气候,种桑成效不著,并没有见到征调绢匹的记载。

与前燕历代君主抗衡的后赵,其境内也出现了种桑活动,桑树被移至宫廷禁苑,命名为“桑梓苑”。对峙在幽、冀一带的燕赵两个北族政权,此时动向引人注意。后赵提倡蚕桑,或是对前燕的回应。更重要的是,石勒重新掌控了华北,需要同汉人宗主豪强展开合作。《通鉴》卷九十一太兴二年(319)十一月戊寅条记石勒即位天王事:

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朝会始用天子礼乐,衣冠、仪物,从容可观矣。^④

此为十六国时期,作为丝织核心的黄河流域,北族政权中首见“劝课农桑”的记载。勒此前已占邺

① 任迎虹主编:《桑树栽培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② [北魏]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激萌、罗新、华喆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5《后燕录》四,第582页。

③ 分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2817、2825页。

④ [北宋]司马光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第2871页。

城,称“邺,魏之旧都,吾将营建”^①,随即北上攻幽州。平冀州后史籍初见“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也是后赵政权第一次核定户籍,征发租调。可视作为前文所叙“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的前奏。“循行州郡”在当时坞壁林立的北方地区,兼具着核查人口、检括逃户的意义。石勒虽出身羯胡,少年时代生长汉地,其对桑树并不陌生。在治下推广种植桑树,已尝试放弃北族经济掠夺方式,转向汉地熟知的租调体系。

此时华北大地战乱连绵,《石勒载记》称:“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河东、弘农间百姓无聊矣。”故石勒“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②劝课农桑牵涉到遣吏巡视等基层运作,此时坞壁林立,实际效果存疑,但据此短短十数年间,石勒曾三次派人“核定户籍”,两次“劝课农桑”,频率不可谓不高,凸显出国家政权与坞壁宗主间的张力。在战乱流离的背景下,种桑对流民有着极大的号召,是秩序安定的象征。《魏书》即称崔衡任河东太守,“先是,河东年饥,劫盗大起。衡至,修龚遂之法,劝课农桑,周年之间,寇盗止息。”^③流民复归田里或是坞壁,也为各郡望族大姓所欢迎,这或许即是石勒“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④的一大因素。北方望族如范阳卢谌、北地傅畅、颍川简绍、清河崔悦和崔迁、荥阳郑略等人纷纷在此战乱时期出仕后赵。《载记》又称:

勒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单于庭。铭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国。^⑤

移洛阳晷影,仿汉宣帝图画功臣都是汉化重要表征,尤具象征意义的是石勒在都城襄国立“桑梓苑”。石勒死后,永和三年(347),石虎“亲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蚕于近郊,遂如襄国谒勒墓。”^⑥如是则石虎在迁邺后复制了石勒在襄国的景观,于邺城重立桑梓苑。《邺中记》:“邺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宫临漳水。”^⑦《水经注》:“漳水又对赵氏临漳宫,宫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月,虎帅皇后及夫人采桑于此。今地有遗桑墟,无尺雉矣。”^⑧石虎在靠近漳水的别宫内筑桑梓苑,正合《礼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之义^⑨,公桑、近川、筑宫这些要素近乎全部出现在邺西临漳宫的桑梓苑中,石虎完全照搬了汉典。三月三日石虎同后在此亲桑,亦合“三月荐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后妃亲东乡躬桑”^⑩的古训,与之相对则是辽代契丹君主从未参与过躬桑的礼仪性活动^⑪。又石虎在迁邺之前,曾巡幸邺城以东近畿,督查桑田^⑫。

前揭慕容廆求桑是其为突破国家形态,力求更上一层楼,主动求变。石勒、石虎所为更像是在占据华北的大背景下,趋于形势同地方豪强展开的务实合作,也是安抚治下流民的明智之举。“神旗所经,衣冠

①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20页。

② 以上俱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41页。

③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24《崔衡传》,第700页。

④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20页。

⑤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42页。

⑥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81页。

⑦ [晋]陆翊撰:《邺中记》,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85年,第2页。

⑧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10《浊漳水》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260页。

⑨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48《祭义》,第3467页。

⑩ 分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7《内宰》,第1476页;卷8《内司服》,第1488页。

⑪ 见萧观音语辽道宗:“且国家无亲蚕事,妾作那得有亲桑语?”见[辽]王鼎撰:《焚椒录》,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1991年,第5页。

⑫ “季龙如长乐、卫国,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4页。

之士靡不变节”已透露了劝务蚕桑,即使是在文书层面形成的惊人效果。作为经济形态的蚕桑,对华夏圈以外的征服者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形塑已缓慢展开。

流民的吸引,秩序的恢复,促成了继石虎第二位“亲耕藉田”者苻坚的登场。史言“坚起明堂……亲耕藉田,其妻苻氏亲蚕于近郊”,随后“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种落……劝课农桑、有便于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皆令具条以闻”^①,已非苻生时代“不食六畜,专务食人,凡杀七百余。民废耕桑,相聚邑居,而有害不息”^②可比。

值得一提的是,北族君主开始种桑的时间又恰好处于公元270—350年间冷谷气候的末端,温度开始回升,桑树种植的外部条件趋于好转。慕容皝于建元元年(343)筑龙城课农桑,石虎于永和三年(347)在“桑梓苑”藉田,而苻坚即位则在升平元年(357),“郊祀亲蚕”之事更在此后,都正处于气候爬出冷谷时期。据满志敏研究,公元350—400年间魏晋南北朝整体气候趋于温暖,正史反常“灾异”仅有两起。这50年间若以10年为一个周期计算寒冷事件发生的频率,则在0~0.1之间,是近400年最低值。而与之相对,在第二个冷峰公元500年前后,寒冷事件发生频率高达0.8,冬季气温也比现在约低2.0℃~2.5℃^③。可以说气候条件的转暖,是种桑恢复活力的客观条件。也正是在此一时期,苻坚统一了中国北方。中古经济流通仰赖布帛,出现种桑活动的北族政权,其境内财富会迅速增加。前秦曾聘于当时已占据丝织业重心的河北,实力胜于自己的慕容暕,太傅慕容评“示之以奢,欲以夸燕之富盛”^④。淝水之战后慕容农在龙城,“劝课农桑,居民富赡”^⑤,直至冯跋建立北燕,还依然感慨“桑柘之益为资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见其利”,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⑥

此一时期以气候小幅升温为契机,十六国君主意识到桑树的重要性,不约而同在境内开展植桑。在此之前,因不同政治体的选择,对汉地传统存在“拒”“迎”两种态度。或者说北族君主,大多是地方经济的破坏者而非建设者,究因在于北族人群并不适应农耕生活,租税体系也与其抗拒编户的传统背离。进入中原后,如何有效治理被提上日程。分析来看,种桑活动仍主要出现在以“五燕”“后赵”为主体的华北一带。“五燕”大体仍为鲜卑慕容部的政治实体,慕容廆的既定主张得到贯彻。“后赵”曾雄踞一时,“前秦”则统一过中国北方,同为割据政权的赫连勃勃等则不见植桑的踪影。只有在倾心汉化,并以治理汉地为己任的政权方会出现蚕桑活动。

在北魏进入中原的前夜,从慕容廆到石虎,有志安定地方的北族征服者开展植桑,展示了同汉地传统妥协,乃至启动自身政治文化转型的政治姿态。历史进程要求他们或多或少地摒弃惯有掠夺传统,转向同中原的合作。种桑恰是彰显此一合作取向的理想选择。重视蚕桑与华夏化转型方向相一致,种桑是最简易,也是政治号召力最强的“汉法”。

三、焚伐与种植:十六国政权对桑树认知的转变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大多数草原部族初入中原,并没有注意到桑树的重要性。对桑树认知经历了从被焚毁到提倡的转变。在历史早期,北族不乏有将桑树“夷伐焚荡”之举,此后因华夏转型的需要,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种植者。然而北族政权波浪式次第南下,使得这种认知需要不断重复,桑树处于“屡毁屡

①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第2886—2887页。

② [北宋]司马光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00,永和十二年六月条,第3156页。

③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52、162—163页。

④ [北宋]司马光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02,太和四年十一月条,第3225页。

⑤ [北宋]司马光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06,太和十年十月条,第3356页。

⑥ [北魏]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澹萌、罗新、华喆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98《北燕录》一,第1092页。按北魏均田令,一户约5人20亩田共种桑50株,冯跋即令一人种桑、柘共220株,几近20倍于北魏,恐是地广人稀之故。

种”之中,使得中古华北经济迟迟得不到恢复。

众所周知,中原农业生产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农桑间作的生产方式又对农时有着较为准确的要求。播种、收获、采桑、育蚕等一系列工作已循环组成了一套齿轮啮合、时令严格的时间表。故孟子提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①,荀子也说“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②整个魏晋南北朝战乱流离,想恢复农业生产十分艰难。掠夺经济盛行,直至北魏宣武帝时犹诏令“擒斩之勋,一如常制。贼资杂物,悉入军人。”^③种植桑树后可食桑葚,能救乏粮之急,是中古时期种桑活动中另一层不可忽视的原因。军粮成为急需物资,“兵”已足备,如何满足“食”自然成了当务之急。

早在王莽乱时,蔡顺即取桑葚与母共食^④。东汉末献帝遭李傕、郭汜之乱流离失所,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亲在御床前为饥人作糜,“九月,桑复生椹,人得以食。”^⑤桑葚原本一年一熟,赖此一年再熟的奇异现象才渡过难关。袁绍在河北乏粮,亦取桑葚为食^⑥。至慕容垂创立后燕时,在邺城一带与东晋刘牢之、前秦苻丕持续攻防,“邺中饥甚”,“幽、冀人相食,邑落萧条,垂以桑葚为军粮。”^⑦北魏拓跋珪攻中山,“六军乏粮,民多匿谷,问群臣以取粟方略”,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取崔逞之说,“乃听以椹当租。”^⑧至贾思勰作《齐民要术》,已明确指出“椹熟时,多收,曝干之。凶年粟少,可以当食”,并引鱼豢《魏略》称曹操西迎献帝无粮,恰逢杨沛献干葚,使曹操大喜过望:“杨沛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干椹……积椹得千余斛。会太祖西迎天子,所将千人,皆无粮。沛谒见,乃进干椹。太祖甚喜。”在北魏后期,收贮桑葚已成为社会应对饥谨的常态化举措:“今自河以北,大家收百石,少者尚数十斛。故杜(周)、葛(荣)乱后,饥谨荐臻,唯仰以全躯命。数州之内,民死而生者,干椹之力也。”^⑨桑葚作为粮食的应急属性,在实用功能上吸引了北族统治者。

不得不做出辨析的是,既然北族征服者都曾开展“劝课农桑”的活动,为何还频现乏粮以桑葚为食。前叙慕容农在龙城“劝课农桑,居民富赡”,北燕冯跋却感慨“此土桑少,人未见其利”,所种之桑都去了哪里?慕容垂与苻坚在邺城拉锯苦战,“幽、冀人相食,邑落萧条”,而慕容温在中山却“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壁垒争送军粮,仓库充溢。”^⑩又如北魏道武帝时张袞任幽州刺史,“袞清俭寡欲,劝课农桑,百姓安之。”^⑪至太武帝拓跋焘,张昭复任幽州刺史时却“州廩虚罄,民多菜色”,致使张昭不得不“使富人通济贫乏,车马之家杂运外境”^⑫,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

北族政权南下中原,初期往往所经焚掠,强行迁徙人口充实劳力,对桑、柘、枣一类经济作物焚伐一空。《辽史·兵卫志》记契丹攻击策略称:“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⑬无独有偶,《魏书》记北魏伐后燕,攻信都、邺之事,道

①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2《梁惠王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54页。

②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6《富国》篇,中华书局,1988年,第179页。

③ [唐]魏收撰:《魏书》卷64《郭祚传》,第1552页。

④ “蔡君仲,汝南人。王莽乱,人相食。君仲取桑椹异器,贼问所以。君仲曰:‘黑与母,赤自食。’贼义之,遗盐二升,受而不食。”见[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15《蔡顺传》,第671页。

⑤ [刘宋]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第377页。此处及后文所引文献中出现的“椹”与“葚”同,从原文,故未修改。

⑥ 见[晋]陈寿撰,裴宋之注:《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第14页。

⑦ [北魏]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澹萌、罗新、华喆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3《后燕录》二,第556-557页。

⑧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32《崔逞传》,第844页。

⑨ 以上俱见[北魏]贾思勰撰,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231页。

⑩ [北魏]崔鸿撰,汤球辑补,聂澹萌、罗新、华喆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43《后燕录》二,第556页。

⑪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24《张袞传》,第688页。

⑫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33《张蒲传》附《张昭传》,第866页。

⑬ [元]脱脱等撰:《辽史》34《兵卫志》上,第452页。

武帝拓跋珪令“军之所行,不得伤民桑枣”^①,事实上即是对这一北族传统的反制。恰可反证此前北族政权经略汉地,常将此类树木“夷伐焚荡”,一则有利骑兵突击,二则可断绝汉人乡土之念,便于掳掠人口。与此相对,北宋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靠种树来抵御契丹骑兵冲击。北族焚桑除上述实际功用之外,更成为了两种文明激烈冲突的宣泄口,《新五代史》记辽太宗耶律德光再度南下中原,问罪后晋出帝石重贵前后时事称:

德光复倾国入寇,围镇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县。杜重威守镇州,闭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阳河,千里之内,焚剽殆尽。契丹见大桑木,骂曰:“吾知紫披袄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邪!”束薪于木而焚之。^②

契丹人看见大桑木,痛骂“吾知紫披袄出自汝身,吾岂容汝活邪!”并聚薪而焚,不难看出北族对“桑”为代表中原文明的抵制。《三朝北盟会编》引《北征纪实》记宋金合谋灭辽,宋兵屯驻幽燕时称:“燕地号沃壤,用兵既久,加金兵残毁,桑柘生具为之一空。我得之仅三年,曾无斗粟尺帛之助。”^③金兵起初亦焚掠桑柘,到金世宗朝才转而提倡种植^④。早期契丹、女真对桑树的排斥,可看作五胡政权的具相诠释。北族统治者对桑树的认知经历焚掠一空,到发现价值,最终推广种植的转变历程。北地五胡族群次第南下,呈波浪式涌进,这种渐进认知又会不断重复上演。此前占据中原,有心经营,在“劝课农桑”号召下种植的桑树会被新一轮北族南下的浪潮湮没,重新经历“夷伐焚荡”的命运,种桑在华北大地呈现出旋起旋灭的景象,这也与北方族群不断加深自身历史进程有关。“庐井荒毁,桑榆改植”^⑤正是对此前历史的精准概况。这也是为何史籍频见“劝课农桑”,甚至在气候条件适宜之时会出现“仓库充溢”,却总不免饥馑流离的深层原因。桑树的种植并非一蹴而就。低干桑需2~3年成材,高干桑则需5~7年,即使是选种低干桑等到树冠定型开始采摘桑叶,进入盛产期也至少需五年时间^⑥。较为漫长的生长过程也是制约北族政权种桑成效,进而影响到政治文化转型的一大因素。

北族统治者初入中原,焚伐桑树,强行迁徙劳力,到其后却巡行州县,劝课农桑,不难看出其对桑树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的态度正逐渐发生变化。北族统治者需要找到切实有效、参与管理广袤汉地的方案,种桑恰可满足此一转型期历史的需要。提倡种桑也为汉地宗自豪强欢迎,可促使流民回归田里,恢复生产,是双方一拍即合的合作范本。然而不幸的是,因北族政权的次第南下,桑树经常需要重新经历被焚伐扫荡的命运,“屡毁屡种”成为了十六国时期农桑业发展的独特景貌。

余 论

桑树真正实现大面积种植,即到统一北方的北魏时期。桑树摆脱了景观功能,正式进入到国家经济秩序恢复的序列中。北魏幽州两任刺史张衮、张昭都曾“劝课农桑”,张衮之弟张恂,在广平太守任上“招集离散,劝课农桑,民归之者千户。”^⑦拓跋晃在太武帝征姑臧时监国,曾下诏“所种者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⑧孝文帝决意汉化,立三长均田制后,留心桑树种植,恢复生产,时柳崇任河北太守问

①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2《太祖纪》,第32页。

②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895页。

③ [北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31《靖康中帙》六,第233页。

④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8《世宗纪》下:“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信赏罚,重农桑。”此为今有记录“劝课农桑”之始。中华书局,1975年,第203页。

⑤ 见李安世上书孝文帝言均田事,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53《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第1290页。

⑥ 毛景山、朱淑杰:《桑树的生长特性及适生条件》,《农业与技术》2013年第4期。

⑦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88《良吏传》附《张恂传》,第2056页。

⑧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4《世祖纪》下,第127页。

“农桑多少”^①，李祥在淮阳“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其子李安世于相州“敦劝农桑，禁断淫祀”^②，宗室元孚任冀州刺史“劝课农桑，境内称为慈父。又邻州号曰神君”^③。有趣的是，擅长劝课，抚恤百姓的“良吏”杜纂，却在群氏聚合的东益州刺史任上以失民和而被征还，《魏书》记其事云：

延昌中，京师俭。敕(杜)纂监京仓赈给民廩。肃宗初，拜征虏将军、清河内史。性俭约，尤爱贫老，至能问民疾苦，对之泣涕。劝督农桑，亲自检视。勤者赏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谴，吊死问生，甚有恩纪。还以本将军，除东益州刺史。无御边威略，群氏反叛，以失民和，征还。^④

《魏书》将杜纂的失败归因为“无御边威略”，事实上身列《良吏传》的杜纂“劝督农桑，亲自检视。勤者赏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谴”，此类施政只适用于汉地的编户治理，而对抗拒编户，逃避统治的群氏并无多少效力。“惰者加以罪谴”只会激化其与氏人的矛盾，最终以失民和而征还。这一故事多少从侧面反映出了不受中原王朝束缚的边裔族群，内心是如何看待农桑定居所带来的编户、赋税问题与威权秩序，结合前揭出现的契丹焚桑树故事，更能给人启发。

桑树原本是中央王朝治下，经营小农经济的普通物产，却在魏晋之时进入到了北族统治者的视域当中。究其原因，是桑树在中原内地所建构的文化内涵中，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文明判官”的角色，境内是否存在桑树成了判定文化高低的依据。桑树在北方部族中并不实用，甚至说与其经济生活传统相抵触。魏晋气候严寒，辽东也不适宜桑树生长。然而慕容廆倾慕华风，希望藉桑树带动北族政治文明转型，在其后历史进程中此举被不断借鉴。根源在于北族初入中原，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文明，如何平衡、取舍，以及有效管理广大土地、民众的严峻考验。种桑恰是在转折时期，行之有效的安定州县的举措。桑树实际上具有将游牧之“游”，固定于土地之上的功能。从前揭可看出，北族政权对于桑树，经历了从抵制焚毁，到提倡种植的转折。北方部族次第南下，又使得这种认知、转型过程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桑树也处于屡毁屡种的动荡中。这一时期对汉地的认知同历史进程一样被频繁中断。北魏廓清北域，孝文帝迁都洛阳，获得较为安定内部环境的北魏终于可以恢复生产，稳定秩序，将桑树重新归位于中原国家应有的序列中。桑树作为中古时期动荡进程的历史缩影，折射出诸多丰富而引人深思的镜像，深刻展示了北族政权与中原汉地间持续不断、引人入胜的张力。

(责任编辑:徐定懿)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中国桑树栽培学[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 [2] 张丕远.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M]. 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 [3] 任迎虹. 桑树栽培生理[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
- [4] 邹逸麟. 椿庐史地论稿[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 [5] 葛全胜.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①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45《柳崇传》,第1134页。

②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53《李孝伯传》附《李祥传》,第1289页。同卷附《李安世传》,第1291页。

③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18《元孚传》,第495页。

④ [北魏]魏收撰:《魏书》卷86《良吏传》附《杜纂传》,第2062页。